

■ 观点

文明整合 历史洪流

卜工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整合周期。这个周期以牛河梁古国的酝酿为起点，以黑龙江、辽河、黄河、长江、珠江为纵深，由北向南波次推进，历史大潮洪流滚滚。当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有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大多经历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不过，这一过程有早有迟，不是齐步走，而是一批一批的”（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正是对文明整合历史洪流的科学预见。

水育文明的神奇

古今中外，关于河流与文明的研究留下数不尽的经典名篇，水养育和塑造文明的理论享誉全球。尼罗河与古埃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与古巴比伦，印度河、恒河与古印度文明相互依存早已成为世界上古史的常识。但是，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与历史环境中水的韵律与风采还是各领风骚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这样说：“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籍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若把家庭作譬喻，埃及、巴比伦、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养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相异源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点”。这精辟的论述生动形象，令人回味无穷。

上古时代的中国是多条河流养育特色不同的文明类型。它们长期磨合，不断整合，才终于汇聚成华夏文明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在中国的版图上，黑、江、黄、长、珠五大河流由北而南垂直分布，将中华大地分隔成五大区域，满天星斗的文明在五线格局中翩翩起舞。仅仅是黄河就养育了夏商周三代等多个文明，这种多子女的大家庭，最需要铭记和弘扬历史经验，最需要家和万事兴的氛围，最需要制度的机制协调管理。客观的历史需求，造就出上古中国团结族群治理水患，敬天保民顽强抗争的制度精英体系，与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神权宗教体系为特色的西方文明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古代世界东西两极文明的分水岭，不可小觑！

文明整合的大势

在距今万年前后，以流域为单位的互动就拉开了帷幕。距今6000年前后，牛河梁古国驱动 的文明整合，直接把国家化进程提高到全新的水平。经过数千时光的打磨，到秦统一以后，中华大地上才形成“多元一体”和“帝国一统”的历史格局。

最初的整合动力来自黑龙江流域。黑龙江饶河小南山距今13000年前就已经形成族群文

化的优势，开始了向周边地区潜移默化式的传播，距今8000年加快南下整合的步伐。距今6000年为辽河流域带去青白玉、积石岩，还有新鲜的族群血脉（卜工《牛河梁考古新观察》《中国文物报》2026年1月24日）。牛河梁古国因此脱颖而出。其标志就是彩陶瑞玉两套礼制的共生，治国理念的成熟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兴隆洼、赵宝沟等一批经典遗址的发现，都能够视为牛河梁古国的先声。“距今5800年前辽河流域崛起牛河梁古国，对中国上古时代国家化进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颠覆性和重塑性意义”。文明整合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这是由原生型文明牛河梁古国为主导的整合，与此前的“潜移默化”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古国成立伊始，就显露出王者无敌的雄心壮志。其南出燕山后继续向南和西进的态势明显。其深远影响大致上分直接与间接两个层次。西进的直接影响就是与仰韶晚期的居民发生关系。燕山以南地区向西直通草原道，一望无际，无险可守，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波浪类型乘势而起，其陶器纹饰明显洋溢着牛河梁古国的文化气息，再向西便是晋陕高原地区。这里原本是仰韶晚期居民的栖息地，但却不得不向西、更南的方向发展。陕北榆林地区的土城土堡从仰韶晚期就开始骤然增多，即是直接证据。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觉醒同样来自牛河梁文明整合注入的新活力。其间接影响是迫使关中仰韶晚期以喇叭口尖底瓶为代表的遗存向西和向南迁移，距今5000年后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新因素和新线索的一系列变化也出于这个历史因素。

南下的直接影响是给予伊洛郑州地区强大压力，甚至传递到安徽凌家滩遗址，乃至长江流域的腹地。两者在玉器方面拥有完全相同的器物，在遥远的5000年前，既没有顺畅的交通，也没有物流快速的服务，只能由北方的来客肩挑背扛，跋山涉水送到眼前。因此，牛河梁与凌家滩的接触虽然文献阙如，但它们玉礼器的相似性却泄露天机。其间接的影响是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恐慌，迫使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居民背井离乡，奔赴岭南。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天门石家河文化也迅速崛起，这些新的变化，恰恰都集中在牛河梁舞动凌家滩的大时段以后，故可断言，其动因就来自牛河梁的文明整合。

第三次文明整合的主角是黄河。中原地区虽是次生型文明，一旦觉醒，却也势不可挡，整合更成就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仰韶时代早期，黄河就对长江流域进行渗透。湖北枝江关庙山，江苏高邮龙虬庄都有其造访的线索。新沂花厅墓地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共存共荣的情景令人过目不忘。黄河流域的空三足器的南渐，更是丰富了整合进程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不过，时代进入到商代中期以后，湖北盘龙城、江西的吴城文化、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才最终宣告这次整合的全面胜利，长江文明因此融入中华文明大系，中国古礼的两大系统才趋于合流。所谓的“中原中心”地位才初露头角。纵观长江流域，

能够在这次文明整合中全身而退，独善其身，毫发无伤者只有古蜀王朝的成都平原。这难道不令人寻味吗？

第四次是长江流域对珠江流域的全面整合。这是“俗化百越，礼教南疆”的长期过程，从距今8000年前湖南洪江高庙文化早期就已经开始，后来的加入者还有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江西樊城堆等多种遗存。其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岭南东部，广东曲江石峡、深圳咸头岭、香港大湾文化等遗址都留下它们的足迹。直到秦军攻打岭南和汉武帝平定南越，公元前110年岭南地区（包括海南岛）完全纳入西汉版图。至此，文明整合才完美收官。

这个过程清晰完整，阶段明确，成果显著，影响深远，是描绘早期中国的神来之笔。其不平衡性、复杂性、互动性、连锁性、周期性、规律性在五线谱式的大格局中绽放着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其碰撞的经验与整合的智慧洋溢在先秦兵书等典籍的字里行间。有鉴于此，可以认为中华古文明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概括说来就是：三大阶梯西高东低，五大流域垂直分布，东西交流南北碰撞，万年始成一统大业。

黄河流域的觉醒

在文明整合的进程中，黄河流域的崛起经天纬地，震古烁今，值得大书特书。苏秉琦先生明确指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属于原生型文明，而中原地区属于次生型文明地区。原生文明是指完全或基本由创造者主体按照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轨迹，在特有的环境中独立产生，基本没有或极少受到外部文明的较大刺激和参照。次生文明是指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本体特征和核心价值虽也有原创成分，但受到了已有（原生）文明的较大影响或刺激。有一定外部参照。就文明整合而言，肯定原生文明是主动方面，而绝不是相反。

牛河梁启动的文明整合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化进程。这个被苏先生称为次生型文明的地区迅速觉醒，快速进入龙山时代。其显著特点就是：方国崛起，城池先行，展示出特色风貌与深刻内涵。神木石峁、襄汾陶寺、延安芦山峁，郑州汜水清静沟、巩义双槐树，安徽凌家滩都是人们耳熟能详、惊艳时光的重大考古发现，可是，静水流深，它们后面却潜藏着异常激烈的文化碰撞，空前逼人的整合态势。北方元戎来势汹汹，黄河居民风声鹤唳。牛河梁舞动凌家滩的研究表明，郑州是通往淮河挺进东南的生死之地，咽喉要冲，因此，这里的三重壕、四重壕接踵而至，平面防御成为重中之重。这些现象中出现距今三千年以后，包括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倘若没有外来势力的介入，黄河沿岸怎能不约而同地拉响全线告急的防御警报？

历史的发展表明，多重壕沟与立体城墙都是国家化进程的硬件指标。苏秉琦曾经将上古时代的国家化进程概括为：古国——方国——

帝国，此后，张忠培推出方国——王国——帝国的主张，李伯谦力挺古国——王国——帝国的方案，还有王巍提出邦国——王国——帝国的看法。这些研究都是在相同问题上的各抒己见，其认识的正确与否理应得到考古实践的检验。

但是，讨论却折射出对“古城古国”的不同理解。苏秉琦明确指出：“三部曲和三类型是中国万年以来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倘若将两者割裂开来，譬犹缘木求鱼。古国是原生型文明，方国系次生型文明，是前者直接影响的结果，所以，两者的相对位置不能改变，更不能否定古国的存在，因为缺少了源头，方国就成了无本之木。

问题关键还在于：邦国与方国有何种区别？这在文献典籍里是没有答案的。一般而言，在甲骨文的世界上，主角是“方”，商人以外都可以用“方”表示，并非都是国家层面的意义；到了青铜铭文和传世文献的周代，“邦”才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清华简等文献也偶见“邦”的出现。那么，王国与邦国又有何种联系？简单地说，王国也是邦国，只是相对更大的邦国。所以，如果要表示阶段性的话，这两个概念只能是二选一，否则，就会犯逻辑学上同义反复的错误。由此可见，就字面的分析来看已然是高下立判。然而，殊不知考古资料还有新的启发。

在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以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大遗址摆在面前：一是周围有墙的城址，二是壕沟环绕的重镇。前者气势恢宏，规规矩矩，武力守卫，“在祀与戎”；后者平凡无奇，多重环壕，居址密集，遗迹多样，已然不是一般意义的普通聚落。“河洛双璧”的汜水清静沟和巩义双槐树遗址无疑最为典型。这种缺少城池围拱的重镇，是否有理由认定其为“邦国”的性质呢？

首先说国与邦的造字初衷。国字的甲骨文本意是强调用武力守卫国土，所以使用戈口结构，城池自是题中之义。而邦字在甲骨文中是下田上木的造型，强调的重点不是守土而是生活，其前身是仰韶时期的环壕聚落，没有城池自在不言之中。王国维认为此字是封字的初形，即封地之意。其次，文献说“黄帝时万诸侯”，禹时“执玉帛亦有万国”。而目前考古发现的城址却屈指可数，所以，环壕重镇必在万国之列。其三，清华简“夏邦”的记载，《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皆可证明邦曾是历史真实的存在。而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城池的线索，不是很能说明邦本无城吗？方国与邦国本来并驾齐驱，比肩而立，只是一种有城，另一种只有环壕，防御设施与治理模式均有所区别。有鉴于此，上古时代国家化进程理当概括为：古国——方国+邦国——帝国，既顺理成章，又比较精准。这便是中国考古格物究理制深度发掘的史情。

由此可见，在牛河梁古国之后，黄河流域经过了文明整合的旗帜，迅速进入群雄并起的龙山时代。

告别“类型” 拥抱“文化” 关注“时代”

——关于甘青地区史前遗存称谓的若干思考

任瑞波 吴耘纛

定的共性，如目前考古学界还使用的马家窑类型、庙底沟类型。这种类型命名出现的原因颇为复杂。截至目前，前两种“类型”的命名方式已在中国考古学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共识，为学界通用。属于第三种情况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都是年代早晚清晰、分布范围明确、内涵特征鲜明的考古学文化，它们相继出现，分布范围虽不完全相同但重心基本一致。不难发现，如果坚持用第三种情况的“类型”命名，将对学界已普遍接受、广泛使用的第二种“类型”形成冲击，造成误解。简而言之，在“类型”的使用中，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在本质上是“互斥”的。

其次，有必要性。已有材料表明，马家窑、半山、马厂诸遗存的地方类型已若隐若现，亟待深入研究。以马家窑文化为例，李水城先生曾明确指出，马家窑文化在东部和西部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要重视区域特色和分区研究。言外之意，他鼓励大家进一步开展对马家窑文化地方类型的划分和讨论。这种先见之明得到甘青各地出土考古材料的验证。如在青海共和盆地发现的相关遗存，学界曾有“宗日式”“宗日类型”“宗日文化”等诸多提法，此类遗存既与马家窑文化有相似之处，又有贵德盆地自身的鲜明特点。再如四川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发现的仰韶晚期遗存，有“姜维城类型”“营盘山文化”“姜维城文化”等多种命名，既有马家窑文化特征的彩陶，又有川西高原本类型物，还有半坡四期典型风格。此外，宁夏南部以曹洼遗址为代表，出土的相关遗存也存在类似情况。不仅马家窑文化如此，半山文化、马厂文化也有同样的情况，李伊萍、张弛、李水城等学者都已指出两支文化有明确的地域性差异。总之，如果继续沿用“类型体系”的命名，很有可能面临在“类型”下面继续寻找和划分“类型”的尴尬局面，准确的地方类型研究将无法持续推进，制约和瓶颈显而易见。而“文化体系”的命名则显然有利于开展以区域特征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地方类型研究。

最后，有可行性。西城驿文化的及时命名，

为从“类型体系”转向“文化体系”提供了鲜活案例。甘青地区史前大多数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工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已经完成，最新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西城驿文化”。该文化的前身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过渡类型”——兼具马厂文化和四坝文化的风格。随着2010年张掖西城驿遗址的发掘，“过渡类型”的各项文化特征逐步明了，李水城先生及时提出了“西城驿文化”的命名，目前已基本得到学界认可。值得反思的是，虽然“过渡类型”较“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提出的时间晚很多，且目前已知的西城驿文化在延续时间、文化特征、分布范围等方面的清晰程度均远逊于后三者，但研究者准确提出“西城驿文化”而非“西城驿类型”，避免了使相关研究再度陷入“类型体系”的不利局面。换言之，既然“过渡类型”都能称为西城驿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没有理由不称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

综上，现有田野发掘材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完全满足从“类型体系”向“文化体系”的转变。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的命名既能避免“类型体系”带来的诸多不便，本身也完全符合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所有条件，且能以最新命名的西城驿文化前后呼应，同时还能推进相关学术问题持续深入，理应广泛使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采用“文化体系”的命名忽略和否认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三者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可以考虑在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研究中，采用“马家窑时代”的概念。原因如下：

第一，“马家窑时代”有其特指的年代范围。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已有较为成熟的划分方案——查海时代、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多数地区的情况大体一致，但甘青地区稍显特殊，部分文化发展阶段与“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并不完全同步。如仰韶时代（距今7000年~5000年）和龙山时代（距今5000年~4000年）重要转折点是距今5000年——庙底沟时代的结束（或龙山时代的开

始）和距今4000年——龙山时代的结束（或青铜时代的开始）。而甘青地区在当地的庙底沟文化结束之后，先后出现了石岭下遗址（距今5500年~5300年）、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4700年）、半山文化（距今4700年~4300年）、马厂文化（距今4400年~4000年）、西城驿文化（距今4000年~38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4200年~3600年），即在甘青地区，距今5300年——以尖底瓶为代表的仰韶传统结束和距今4200年——以高领罐为代表的齐家文化出现才是重要的转折点。基于这种考虑，“马家窑时代”（距今5300年~3800年）的提出，似乎能够更加准确地彰显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进程。

第二，“马家窑时代”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从文化面貌上看，马家窑时代的内涵特征也十分突出：首先，在手工业技术成就方面，这一时期已发现了青铜冶炼的重要线索，彩陶艺术也达到了中国史前陶器的又一巅峰。先进的

深度探索的召唤

文明整合的研究是撬动中国上古历史大门的重要支点。新思路新境界驱动新探索。

一是重新估计牛河梁的影响力。牛河梁横空出世40多年，经历坎坷。2023年12月才终于被权威机构确定是古国第一梯队的代表，距今5800年。在文明整合的视角下，很容易发现当今研究不到位的主要原因，依然是对苏秉琦国家起源“三部曲和三类型”理论的认识不足，对原生型文明影响力的估计不足，对黄河流域国家化进程的趋势理解不足。牛河梁不是地方性文明，其意义远远超出大凌河与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排头兵，是文明整合的发动机，是世界文明的领头羊。牛河梁开辟出通往“多元一体”的人间正道，擦亮中华文明的底色，不愧是原生型文明的杰出代表。牛河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上古时代的重大课题，其国家实体、制度创造，治国理念，应对策略以及王权治理模式亟待深度研究。牛河梁的历史贡献及其在夏商周三代发扬光大的事实，足证苏秉琦文明理论依然是指导中国上古研究的旗帜与灵魂。

二是认识上古社会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实践表明，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只有王者统领的王权模式，还有巫觋主宰的神权模式，祀戎分离的两权共治模式。有些研究对良渚反山墓葬属于巫觋家族墓地的认识耿耿于怀，似乎如此便低估了良渚文明的意义，其实，这恰恰揭示出长江流域别具风格的治理模式。也将这个重要的问题推到学术前沿，文明类型的差异性 与文明整合必要性同时显得更为突出与迫切了。

中国上古时代巫觋的影响和作为史不绝书，考古资料中其形象更是具体鲜活。距今九千年前的饶河小南山，距今八千年的舞阳贾湖都舞动着巫觋的身影，甚至距今万年的上山文化也有巫术活动的痕迹。但是，在辽河流域，牛河梁古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王者至尊，大权独享的王权模式。所谓的巫教时代在牛河梁古国早已成为过去式。巫觋只能在古礼体制中活动，他们是仪式的主持，社会活动的操办者，礼制建设的参与者，是知识阶层的代表也是文化传播的精英，更是传统教育的主力军。然而，他们与凌家滩祀戎合作的两权模式相比，其地位已经黯然失色了，更不如长江流域的神权模式那样形象丰满，氛围浓郁。对此，文献虽语焉不详，但考古资料却铁证如山。

三是塑造文明整合的大局面。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牛河梁古国的南下，令许多研究者错愕。事实证明：上古时代悠悠岁月，文明整合如如火如荼，总体态势由北而南，年代周期相对漫长，历史洪流波次推进，滚滚大潮不可逆转。诚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文明整合却始终沿着历史规定的方向拓展。倘若对此缺乏清醒认识，那就不能认识黄河流域龙山时代崛起的历史原因，就不懂得方国与邦国的考古学意义及其在国家化进程中的位置，更难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的类型多样性，如此，何以知晓文明整合是“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必由之路呢？

技术和精湛的艺术远超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在聚落与建筑方面，以寺洼山三重壕城、秦安大地湾F901、南佐大型宫殿F2等为代表的特色建筑同时涌现。总之，青铜冶炼技术、彩陶绘画艺术和官殿建筑水平，既代表了这一时段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也彰显出甘青地区早期文明的独特风格。

第三，“马家窑时代”有明确的文化支撑。

从“时代”命名的学术逻辑来看，正如仰韶文化之于仰韶时代、龙山文化之于龙山时代，“类型体系”命名下广义的马家窑文化可支撑马家窑时代的提出。马家窑时代的确立，也正好可以弥补因“类型体系”命名被取消、广义的马家窑文化不存而产生的一些学术遗憾。

因此，我们建议，在甘青地区，珍藏曾经发挥过具有举足轻重学术作用的“类型体系”命名，转向更加符合现实客观情况的“文化体系”命名，坚决使用“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等称谓。与此同时，考虑引入“马家窑时代”的概念，用以专指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西城驿文化这一连续发展近1500年的特殊阶段，以便更好地完善甘青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增强西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学术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进程。

马家窑文化应如此，仰韶文化亦然。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数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保护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监测、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高质消杀服务、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
--	---	---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3572270596（张总） 座机：029-88246388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E座4F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 宸 丁淑娟